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徐以骅 主编

徐以骅 邹磊 主编

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徐以骅 主编

徐以骅 邹磊 主编

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徐以骅,邹磊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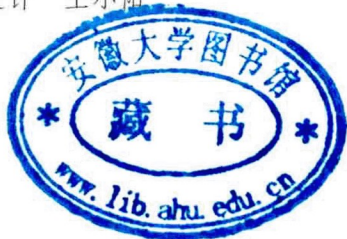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12335-9

I. ①宗… II. ①徐…②邹… III. ①宗教—关系—
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B911②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5793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

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徐以骅 邹磊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插页 4 字数 233,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35-9/D·2495

定价 42.00元

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本论丛由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主办

序

国家利益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自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急速提升,已然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考量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来看,宗教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的佳话至今传诵。实际上,宗教交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其影响往往要比经贸等交流更为深刻和持久。

然而,就目前而言,宗教仍是中外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由此造成的后果是:(1) 尽管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宗教传统和宗教资源,并且已成为全球宗教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输出国,但中国在宗教领域的国际贡献却远未得到充分的承认与肯定;(2) 尽管各种中国宗教信仰在海外拥有庞大的信众群体,却未能成功地转化为维护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在海外亦未形成宗教领域的“知华友华派”;(3) 尽管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已举足轻重,但在宗教、文化等领域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却明显不足,在对外交往中呈现出明显的“软硬失衡”的态势;(4) 尽管中国致力于营造和谐健康的政教和教教关系,却未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以及在宗教领域的政策论辩能力,常常在一些国家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和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运作面前陷于被动。

简言之,宗教目前基本上是中国外交中的“负资产”而非“软实力”和

“正能量”。因此,在中国全方位“走出去”和国家利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宗教与国家总体外交的良性互动,便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须面对的战略问题。

近年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一直试图从基于全球政治且立足中国社会的研究视野,开展对“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的研究。在此思路下,本研究团队先后提出的概念、观点、框架和课题包括:(1)“后传教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外宗教互动比传教时代更为多元和双向;(2)“信仰中国”,这一叙事旨在促进宗教与国家整体外交及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3)“地缘宗教”,目前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形势严峻,但地缘宗教的环境却相对宽松,中国海外利益的集中点都是地缘宗教的轴心或枢纽地区,因此有必要充分探讨我国的宗教地缘格局以及宗教作为中国不断扩大的海外和全球利益的柔性保护网络的可能性;(4)“国际宗教贸易”,通过对浙江义乌、福建莆田、河北曲阳党城乡等地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新丝绸之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宗教学的解读,全面勾勒中国宗教商品的全球生产与营销网络以及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和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注,并将相关的讨论引向深入,2012年6月3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的近40位专家学者与研究生济济一堂,围绕如何在新时期推进宗教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良性互动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研讨会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指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宗教正被许多国家用作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手段,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应当有宗教的参与。目

前,以佛教、道教文化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对宗教文化战略的意义依然认识不够、思考不细,存在某些深层次的障碍,宗教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我们应确保宗教文化在我国的健全发展,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主动、积极地“走出去”,不断扩大中国文化影响,使中国更加自信地融入国际社会。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金光博士基于长期外事工作经验,全面介绍了我国宗教界的对外交流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抵御境外渗透、树立我国良好形象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他还分析了我国宗教在发挥其公共外交作用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并从观念、体制、人员等各方面提出了远景思考。暨南大学客座教授、马来西亚籍华人学者王琛发认为,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信仰版图源于中华,又落在所在国的基层生活环境中,不仅是中国潜在的软实力,更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与所在国或多国交流过程中忠实的协调者、说明者、聆听者和转述者。因此,中国应主动加强与海外华人信仰组织的交流,使我国的公共外交能够找寻到切实的载体。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甘德政博士也指出,如何利用中国丰富的宗教和文化资源,针对海外华人华侨信众展开“与信仰有关的外交”,是当前中国侨务工作应努力的方向。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邹磊博士细致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和中亚)伊斯兰世界之间海陆“新丝绸之路”得以兴起的表现形式、内在逻辑和国际效应。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认为,随着伊斯兰世界在中国总体外交中战略地位的提升,中国应在继续推进朝觐外交的基础上,大力强化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宗教人文外交。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郑筱筠研究员提出,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国应适时调整对东南亚的战略,积极发挥南传佛教的交流平台作用,以跨境民族为支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当地民众)的联系。

二、宗教与各国对外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关系学院黄平博士指出,公共外交新行为体的增多、新传播环境的出现和全球治理

的需求这三个新的背景赋予了公共外交新的内涵,从而让宗教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资源具有了可能性。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涂怡超博士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全面考察了当代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梵蒂冈和俄罗斯如何在公共外交中运用宗教话语和借助国内外宗教组织等方式形塑外交软实力、构建国际话语权。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邱永辉研究员认为,同样是处于大国崛起的阶段,印度良好的宗教国际形象对有效化解“印度威胁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成功的宗教外交实践值得重视。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贾付强博士则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1943年至1953年期间苏联依托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在宗教领域开展对外交流提供了相应的启示。王琛发则重点讨论了“重返亚洲”背景下美国对东南亚宗教组织公共外交的观念与实践。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的论文检视了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活动如何有效地促进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缓和,并认为其国际关系运作方式看似“愚钝”,实则充满政治智慧。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钮松副教授则分析了伊斯兰宗教朝觐对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以及朝觐在改善沙特阿拉伯与世界各国关系中的作用。

此外,与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还分别就美国“新时代宗教运动”、儒学视野下的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宗教反恐策略、美国宗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等主题进行了发言。

2014年是《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主办单位所在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庆五十周年。无独有偶,2014年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庆五十周年。南北两个研究单位在同一年建立绝非偶然,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对国际问题研究整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1963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在指出国内“研究外国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列举了该项工作所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学术单位的研究和教学人员

对现实斗争参加很少,对外国情况相当闭塞,静止的研究和实际活动没有很好结合”,认为该项工作“还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不能很好地为国际斗争服务”。毛主席于同年12月30日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显然,毛主席把研究世界宗教作为“研究外国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亚非特别是印度、阿拉伯国家的人才)、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才)在同年诞生,而此三大院校目前仍为国内国际关系/政治科研、教学的重镇。因此1964年不仅成为1949年后我国正式开展机构性的世界宗教学术研究的元年,也蕴含或预示了宗教研究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两大学科未来相互渗透的发展方向。由于20世纪下半叶全球宗教复兴、国际关系领域的“宗教回归”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宗教国际化、政治化甚至暴力化等趋势,近年来不少学者尤其是宗教学研究积极介入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讨论,把关注点从“身边”转向“天边”;而国际政治/关系学界对宗教问题从完全忽略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从“世俗”转向“神圣”,因此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出现相互取经和借鉴的对流趋势。在纪念上述科研和教学机构成立五十年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发展,宗教研究和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以及作为两者之结合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和宗教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也将会迎来更全面深入的发展。

本书收入了上述会议的主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编辑和修改。2013年7月上海市教委批准建立了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原拟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是新建中心

的组成机构之一,而两个中心现为本丛书联合主办单位。我们在此对上海市教委对高校智库建设的大力支持,对在不同程度上资助本研究的复旦大学“985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建设”、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GJW00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及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尤其对一向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学界同仁和本论丛的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稚嫩之处在所难免,祈盼方家指正。

本辑主编

2013 年 8 月 8 日

目录

序 国家利益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 1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文化战略 卓新平 / 1

信仰中国：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和两岸关系 徐以骅 邹 磊 / 7

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成绩、挑战与远景 刘金光 / 26

宗教公共外交之可行性与重要性分析 黄 平 / 34

公共外交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信仰组织 王琛发 / 50

宗教与中国侨务工作 甘德政 / 67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新丝绸之路”的兴起 邹 磊 / 86

伊斯兰势力的“重整和分化”与我国中东公共人文外交的应对

马丽蓉 / 125

南传佛教与中国对东南亚战略及公共外交 郑筱筠 / 137

明代妈祖信仰的南海版图——明清两朝外交文献的对照解读

王琛发 / 147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 贾付强 / 164

政治愚钝与道德感染力——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国际关系运作

及其借鉴意义 彭小瑜 / 190

伊斯兰宗教朝觐与国际关系 钮 松 / 204

传统儒学视野下的现代国际关系 曾 亦 / 218

全球化与多元信仰的日常化实践：田野视角中的美国“新时代宗教运动” 潘天舒 / 249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文化战略

卓新平*

当代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全世界约85%的人口信仰着各种宗教,从而使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比重颇大的宗教因素。因此,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什么宗教,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参考系数,并有其吸纳还是排拒、亲近还是疏离等潜在的心理影响、情感内容。要想在国际社会这一大舞台上自强自立、广交朋友、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则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硬实力”,同样也需要思想、文化、宗教等“软实力”。所以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充分认识到宗教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发挥重要的“软实力”作用。

在当前国际政治中,人们非常关注宗教文化战略的运用。宗教在人类不同地区的文明、地缘政治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本身所拥有的传统文化力量及其对于相关民族、地域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凝聚力使世界政治及人类文明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圈和政治板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力量的聚散、重组。例如,亨廷顿在提出其“文明冲突论”时,也论及人类文明因其历史进程中“涨潮”、“落潮”之冲撞、融汇而留下了五大文明,加之现代社会相关地区文化变迁及重组而形成的三大文明,由此而有他的“八大文化圈”之说。对此,他认为每一文化圈都由宗教构成其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如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圈、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波

* 卓新平,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斯文化圈,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南亚文化圈、以神道教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圈,以及新兴起或正在形成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斯拉夫文化圈、以天主教为核心的拉美文化圈,此外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本土宗教正在争夺或共构其核心精神的非洲文化圈。¹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或联合,加剧了政治上的纷争,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于是,在国际联合及结盟中,宗教的力量或信仰因素亦悄然加入,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中实质上乃有着宗教的矛盾及冲突。

当前国际关系中大国政治极为突出,但小国外交也不示弱。少数大国笑傲天下,在军事实力之后亦有其宗教力量的炫耀。而一些小国则以联盟、结盟的方式形成合力,在国际较量中不甘落后,也要一争高下。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力量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上有着相对较强的态势,但在国际政治、文化关系中却相对独立,甚至有被人为孤立、包围的危险。除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对立,反华势力的一个重要攻击缺口就是针对中国的宗教状况。中国社会主流“无宗教”的这种无意识或潜意识,实际上却给了境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国“没有宗教信仰”、“不敬神”、“不信神”的口实,而这种“Godless”的指责在宗教文化氛围的国度会形成对中国极为负面的影响,从而导致对我们文化“软实力”的削减和排拒。

此外,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如何对待基督教在华发展及与华关系就具有独特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欧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到基督教的对华态度。西方基督教大多参与了抵制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国政府则让西方宗教差会离开中国,而中国基督教只是以“三自爱国”运动才获得其在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从此,中国对“洋教”的谴责及怀疑延续下来,迄今仍能看到这种影响的留存。20世纪70年代,美国恢复与中国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国内教会理论家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政治神学家支持中美建交的主张影响。还在冷战时期,尼布尔就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态度过于固执和极不现实,他批评那些坚持美国拒绝承认中国、拒绝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看法非常唐突、不妥。他主张美国尽早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认为这样可以促进中苏利

益的自然冲突,而中苏两国矛盾的公开及其激化则势必有利于美国从中得到好处及实惠。²中美建交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构成了中美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政府支持了至少三次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访华,其中多为基督教界人士。而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等访美活动,亦有着中国政府强力支持的背景。目前中国印刷《圣经》中文版已逾 8 000 万册,由此亦已成为中文《圣经》的最大输出国。

不过,前苏东的剧变和解体,媒体关于天主教教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手搞垮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传言,一度使中国舆论对基督教高度警惕。而美国福音派葛培里等人呼吁美国政府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举动,既使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良性改善,亦让中国对美国福音派的态度明显好转。在这些变化中间明显有着基督教与政治的互动及其交互影响。可以说,基督教对华态度及在华处境是否好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发展走向上的晴雨表。从这一层面来看,我曾说过基督教在华处境的根本改善,在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真正好转。同理,伊斯兰教在中国与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的交往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的宗教情感往往会影响、支配其民众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总之,宗教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乃得以充分体现。

为此,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文化战略举措。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必须有宗教的参与。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注意到宗教文化走出去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并以宗教文化等公共外交、大众外交形式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其中佛教、道教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果,如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召开的三次世界佛教论坛,使“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和谐世界,同愿同行”的主题成为一时流行的世界佛教精神。而道教界也先后组织召开了世界《道德经》论坛和国际道教论坛,形成一定的世界影响。佛、道教的上述学术活动及文化出访,使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掌握了一定的主动,获得显著成果。当然,这种宗教出访外交背后有着政府的身影,甚至会有政府的直接参与。宗教“软实力”的“巧用”在国际舞台上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极佳效果。不过,

我国在儒教、民间宗教的理解及实践上则尚存明显的差距,出现了某些被动局面。例如,上百所外办的孔子学院缺少儒家基本精神的传播和儒教的信仰影响,因此在教汉语之外仍应有所开拓,以使这些文化书院真正有着文化“灵气”。而我们对中国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的态度和处理方面也颇有商榷的余地,尤其是一些对之不承认、不吸纳的强制性举措使中国民间宗教在海内外关系失衡,海外华人以中国民间信仰来返华认祖寻根活动的频频失利,尤其是他们本来源自中华民间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当作“敌对势力”或“黑恶势力”来处理,使他们会从“向心”变为“离心”、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事实上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交往上也是一种失策。因此,我们在对待儒教及民间宗教时也应有关国际关系和文化战略层面上的考量。

从总体来看,我们目前对宗教文化战略的意义认识不够、思考不细,仍存有一些深层次的障碍,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顺利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机遇。中国会继续保持对国际社会的开放,要与世界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的人士打交道。这种开放性、外向性发展需要中国更主动、要全面地融入国际大社会,更积极、更灵活地理顺其国际关系,因此就不应该只是消极地抵制外来影响、不能只是把宗教视为外来“渗透”、“演变”的异己力量。我们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也不能把中国传统宗教当作堵塞外来影响的挡板,而应该使之成为走向世界、沟通国际社会的桥梁。我们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宗教与其文化、价值观及意识形态都是相协调、相结合、相统一的,有着和谐整体共构的结构与关系。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其社会的和谐及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就必须正确、睿智地面对这一事实。应该说,我们社会与宗教的和谐以及让宗教促进我们社会的和谐,的确是一种双赢的睿智。从国际大社会的全局来看,“敌人”与“朋友”乃是相对的、变化的,有时甚至是可“换位”的,在国际舞台的纵横捭阖中我们在精神信仰、宗教追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并没有必要过于死板和僵化,而应该把握与各方对话的灵活性、掌握对话的主动性,善于驾驭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在其复杂多变的发展中游刃有余,